

记者手记

风云人物

陈志武印象

□本报记者 陈莹莹 杨博

初见陈志武,是在纽约中央车站旁的耶鲁俱乐部。五月初的连绵细雨,让初到美国的我们感到丝丝凉意,而就在这个气氛雅致的环境里,与陈志武的一席交谈令我们暖意融融。柔和的灯光下,陈志武用平和的语调向我们讲述自己少年时代的经历,也讲述着他对大洋彼岸中国金融改革的关注。

不到一个小时后,陈志武看了看表,用抱歉的口吻结束了这次对话,随后匆匆而去。再次见面是两个月后的北京金融街威斯汀酒店大堂,这一次陈志武依旧是风尘仆仆。

忙碌,成为我们印象中对陈志武的第一个关键词。数次联络和采访,陈志武总是在国内或国外不同的城市。即便在某个地方停留的时间稍长些,他也安排了大量的工作。

眼下,陈志武每年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国内,在这短短三四个月时间里,他不但要带领自己的研究团队进行调研,还要在高校间举办讲座,此外还有数不清的学术交流活动和顾问工作。更重要的是,在如此紧张的工作间隙,陈志武仍旧坚持与家人共享天伦之乐。

而在他的学生看来,无论日程多么紧张,陈志武却总是能将工作与生活的安排得井井有条。能够将时间这一稀缺资源进行最合理的配置,这或许是陈志武作为经济学家特有的本领之一,也是最令人佩服的一点。

与许多学者不同,陈志武的治学态度非常包容,这是让我们印象颇深的第二个关键词。无论是谈论学术问题还是生活趣事,陈志武总是保持自己惯有的不急不缓的语速。陈志武几乎没有对某个观点过于激烈的表达,也没有太强烈的情绪起伏。即使对学术上不尽相同的观点,他也显得颇为包容。我觉得无论是治学还是生活,都应该是包容的多元化的。”对于我们提出的任何一个问题,陈志武总是在略作思考后认真地予以回答。

执着,是我们对陈志武的第三个关键词。我们相信陈志武对于自己的金融学研究领域有着极大的执着,才能对其研究领域中出现的新问题有绝对的耐心。实际上,正如陈志武的朋友和学生而言,作为一名金融学家,定量分析才是陈志武的强项。然而,在开始关注中国经济金融研究领域之后,陈志武才开始尝试将金融学与中国历史、儒家文化、哲学等结合起来。或许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和分析中国金融领域所存在的某些特有的问题吧。总而言之,对于中国经济金融问题的研究,陈志武坚持自己的研究框架,并用自己特有的研究方式。

平和、淡然、包容,具备了这些特质的陈志武,或许更像一个社会学者而非金融学家。也正因如此,陈志武才会那样包容和坦然的去接受不同的观点,甚至是接受他人的质疑。然而再细细品味,在陈志武包容的胸怀中,仍旧有着对于金融学研究的绝对坚持,比如其对于金融学的发散性思考,又如其结合多学科的跨领域的研究方式。

他是蜚声海内外的经济学家,在2000年一份世界经济学家排名中,他的名字位居第202位,而在前1000名经济学家中,仅有19人来自中国。

陈志武 一个金融学家的思想王国



履 历

陈志武 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清华大学访问教授。

1983年获中南工业大学计算机学士,1986年获国防科技大学硕士学位,1990年获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博士学位。

曾参与创办Zebra Capital Management基金管理公司并在2001至2011年间为其两位合伙人之一。1998年参与创办了Valu-Engine公司。

主要研究和教学领域:金融经济学、金融社会学、制度与市场监督、资本市场、资产定价和投资管理、金融与文化、金融经济史等。最近十几年,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市场发展和其它新兴资本市场问题。

2012年全球咨询公司Burson-Marsteller在其G20 Influencers' report(“G20国家最具影响力人物报告”)中将其列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十人”之一。2006年Wall Street Wire将其列为中国十位最具影响力经济学家之一。

获得美国默顿·米勒研究奖、芝加哥期权交易所研究奖等多项奖励。2009年著作《金融的逻辑》获得过23项最佳年度图书奖。

□本报记者 杨博 陈莹莹

短暂的拨号音响过,电话那边传来陈志武低沉而平和的声音。此时是美国东部时间周日晚上十点,还在周末休息的他与我们进行了又一次越洋交流。

一个月前,陈志武刚刚结束在中国的行程重返美国,这一次他在中国停留了约三个月,期间在北京、上海、哈尔滨、三亚等多个城市往来穿梭。在进行学术调研的同时,也享受着与家人共聚天伦的幸福。

而今,无论是夜里的一通越洋电话,还是一封即时往返的电邮,亦或是美国、中国两地间的往返,对于陈志武来说似乎都已是一家常便饭。而在他决定赴美求学的二十六年,一切还是另一番模样。

1986年暑假,为了联络美国耶鲁大学的招生办公室,陈志武在北京东城区一个发国际电报的地方排了整整一天的队。用他的话说,自己当时“精确地”写下几个字,将电报发往大洋彼岸。这斟酌许久才发出的寥寥数字,花费了他几乎一个月的工资。

那个时候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联系、沟通都是以写信为主,一个来回至少要一个月,更快的方式就是发电报,但每个字都很贵。”谈起那个年代,陈志武感慨道:“那个时候(中国)非常与世隔绝。”即便到了2000年左右,电话慢慢多起来,打国际长途的费用仍然非常昂贵。陈志武说那个时候中国跟外界的距离从通信的意义上来说非常遥远。然而在过去十年,互联网的兴起、手机的普及,以及新兴联络方式的出现,大大缩短了中国与外界的距离。联系方式的扁平化,促使陈志武更多关注到中国的发展,也注意到中国传统价值体系发生的变化,这引发了他对中国文化与金融发

展之间关系的研究兴趣。

一个命题： 文化的金融逻辑

还在清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林展,从2010年开始加入陈志武的科研团队。现在,他和其他助教每周都有三四天泡在位于故宫边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清朝的刑科题本,也就是报送给

查明年将启动第二轮,此后每隔一年进行一次,整个历时将达十年。如此大的样本,如此长的时间跨度,以及如此边缘性的话题,让陈志武的课题研究充满了想象力。

“在二战甚至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大多数国家都没有把很详细的历史资料留存下来。这使得以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宏观研究样本数量太少,令只用大的宏观视野做研究的方式,最终从统计意义上得到结论的机会不是太多。”陈志武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把大的宏观层面假设放在微观层面进行研究。像胡适讲的那样,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目前,这项调查仍在进行中,初步结果显示,在中国特别是中国的农村地区,生女儿的家庭比生儿子的家庭储蓄率要高;在孝道文化比较强的城市地区,生儿子的家庭储蓄率会偏低,而孝道文化淡的城市地区生儿子的家庭储蓄率会高一些。

中国的孝道文化如何与储蓄率挂钩?陈志武认为,中国这些年储蓄率一直高,一方面是因为金融市场不太发达,未来安排生活保障的工具选择比较少。另一方面的重要原因是与独生子女政策有关。“独生子女让传统的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的价值体系受到打击。这些年,随着整个中国社会人口流动性大大增加,养儿防老的孝道文化越来越靠不住,这迫使很多做父母的不得不存更多钱,以保障未来。可以说,孝道文化的淡化推动了家庭储蓄率的上升。”

他 陈志武)很厉害的地方,就是将顶尖的学术研究跟现实生活密切联系起来。比如从养儿防老这样的话题,延伸到不发展金融市场会影响很多人的生活质量。”谈到陈志武的研究,林展言语间流露着发掘宝藏般的兴奋。

如今,陈志武每年都会利用回国的机会做客清华,与那里的博士生和博士后做交流,讨论研究,听各种各样的报告。“不管质量高不高,他都会坐在那里认真听,认真做指导。”林展说。

不止如此,陈志武还在与清华方面共同筹建一个市场与社会科学方法研究中心,期望通过更规范的社会科学方法研究中国问题,利用国际上主流的方法,让学术变得更纯粹,让研究回到最初的目标——为社会创造知识。同时也借助这样一个平台推动对青年学生的培养,推动中国的学术气氛和环境的提升。

一种信仰： 追寻个体自由

在陈志武看来,没有经济方面

的自由和安全,没有对未来的足够的保障,将迫使人们放弃对个人权利的追求,放弃自己的尊严,放弃自己的自由。说到底,有东西吃、有衣服穿、有地方住、有钱赚,个体才能变得更自由,这对于整个社会结构和价值体系的变迁也至关重要。对“个体自由”这个基本命题的关注,成为陈志武诸多研究里的主线。然而对于这样一个命题的思考,却并非只是源于学术上的探讨。这个从湖南茶陵走出来的农民的儿子,骨子里就有着与生俱来的对人的尊严的探寻和敬畏。

1985年,还在国防科大读研究生的陈志武经历了人生中一件看似平常却触动心灵的小事。那一年的一个傍晚,陈志武所在的系进行了一次突击检查,看学生有没有穿奇装异服,看学生的头发长不长。系里面将所有的学生都叫到操场上,然后由系里面的政委、系主任还有其他的领导从

前到后一个个审查。

“当系主任和政委从我身后走过去的时候,我看见他们用那种审判的眼光来看我,我的血压迅速攀升,那一瞬间我几乎要用脚踢他,但后来忍住了。他们凭什么用这种眼光来看我?我觉得那是对我最大的侮辱,我没有办法接受这种侮辱。”至今谈起那段经历,陈志武仍略显激动,这件事促使我思考,为什么人要活着?人的尊严来自哪里?”

1986年,在出国留学风的吹拂下,陈志武也选择踏上负笈美国的留学之路。怀揣着来自耶鲁的录取通知书和几十美元,他登上美国的飞机,而这离他走出茶陵农村的山沟沟才不过几年时间。

1990年,陈志武从耶鲁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此后陆续在美国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和俄亥俄州立大学任教,1997年晋升为金融学副教授,1999年晋升为金融学教授并重返耶鲁担任终身教职。不到十年时间,即能成为耶鲁大学终身教授,即使是欧美经济学家也很难达到这样的高度。

在“落地”美国后的十余年时间里,陈志武的研究基本上没有太多关注中国,他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放在金融、经济学的纯学术研究上,而且经常在诸如《美国经济评论》等全球顶级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凭借自己擅长的资产定价,陈志武逐渐获得西方学界的认同,并成为一个优秀的数理金融学家。在民生银行工作的老朋友李利明看来,陈志武当年的学术研究是纯理论的数理金融领域。“坦率地说,他研究的东西,已经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金融学,而是高度数理化的数理金融,几乎只有数学家或者理专业的人才能看得懂那些模型、定量分析。”

正是这段单纯的、安静的求学历程,让陈志武从一个零起点的金融学学生,成长为海外金融经济学圈子里知名度越来越高的经济学家。在2000年欧洲经济与统计高级研究中心(ECARES)发布的一份世界经济学家和研究机构的排名中,他的名字位居第202位,而在前1000名经济学家中,仅有19人来自中国。

一次回归： 关注中国金融改革

在陈志武远离家乡的岁月里,中国也经历过深刻的变革。2001年的一个偶然的机会,陈志武翻到了一本《财经》杂志。这份在当时因曝出银广夏等一系列内幕交易丑闻而风靡一时的杂志,让陈志武眼前一亮。“从开头都在理性地分析中国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其理性的程度,让我大吃一惊。”

从此,陈志武开始将目光投向中国国内的经济现象和问题。起初他更多关注的是制度问题、社会问题、国家问题,在《新财富》上开设的专栏也以介绍美国证券法案、监管规则等为主。但慢慢地,陈志武的注意力回归到对个体自由和人的尊严的探寻上来。在他看来,无论是产权、法律、新闻自由、社会文化以及个人选择,无论是文化还是制度设计,都应围绕着“人怎么活得更好”这一核心。

“大概是2004年至2005年,我忽然想,美国有非常发达的资本市场,人们有很多金融选择。安排一辈子生活,无非就是找一个更恰当的、不同的金融产品的投资组合。但是在传统的社会,在中国,当这些东西都不十分发达的时候,人们怎么解决未来的生活?人的尊严,人的命运,是按照一种怎样的金融规则在安排呢?”

也就是2005年,陈志武开始在国内建立研究团队,启动调研

项目。如今,他每年有三分之一的时

间都会呆在国内,做学术交流,进行课题调研。而且,他也希望能将自己在东西方经济学界所积累的学术成果,更多地传递给中国金融学界。

“记得有一段时间在武汉帮一个好友给他的学生们讲课,当时正值武汉最热的六七月,而教室上只有一个大吊扇,我几乎每上一堂课就要出去

换一件衣服,因为衣服都湿透了。”说到这里,陈志武忍不住哈哈大笑。作为一名同时研究东西方金融、并取得相当高成就的学者,陈志武总是会被要求比较中、美经济金融发展的差异。陈志武也总是颇为无奈地表示,很难有一个绝对比较。

从制度环境、社会变迁的角度来看,中国现在的经济和100年前的美国经济很相似。但100年前的美国金融市场没有互联网、没有信息手段等,而今天的中国金融市场却能够享受这些便利,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经济金融没有落后那么多。”

作为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的陈志武是资产定价理论研究的高手,而陈志武也知道,研究中国当前的经济、金融问题,除了要有深厚的金融理论功底外,还需要从文化、制度、历史等方面来理解中国的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

变化中的中国金融给了陈志武越来越广阔的视野、越来越深刻的理解。在陈志武看来,目前中国的金融改革面临的阻碍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当前国有企业仍是既得利益群体。过去这么多年,我们通过国家监管机构,为地制定利率水平,包括存款利率、贷款利率等,使国有企业能以尽可能低的成本获得贷款。而现在利率市场化改革,对民营企业是非常好的,但对国有企业却非常不利了。”

另一方面,还是在于决策层能否有彻底改革的决心。有人说一旦把利率放开、特别是允许民间借贷进入金融系统以后,会有更多的民营资本家在逐利的冲动下放越来越多的高利贷、有更多的剥削等,在我看来这种想法是根本错误的。”

即便如此,陈志武还是坚信,未来包括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打破国有银行垄断性等在内的中国金融改革一定会实现。因为这些非市场化的利率、汇率和国有银行的垄断地位,都是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所造成的,所以如果决策层有这样的愿望去纠正去改革,应该说成功的概率是非常高的。”

老友李利明第一次见到陈志武是在2001年,那时正是陈老师开始致力于研究中国金融改革等问题的开始。”

李利明说,自从从研究重点回归到中国金融领域,陈志武每天花费的工作时间几乎是在做数理金融研究时的两倍。而这样的努力终究是有回报的,他的很多金融改革方面的观点,比如金融监管、资本市场改革等方面,无论是在国内学界还是政界都有较大的影响力。”李利明说,陈志武的观点并不是“快速救心药”,而是导向型、渐进式的,国内许多省部级高官也是陈志武的忠实读者,并对其观点颇为认同。

一个慈父： 女儿是幸运的礼物

“人生就是各种随机事件的组合。”在陈志武看来,自己的人生很随机、很自由,没有任何人给自己制定计划,自己也没有计划,所有的变动都是兴趣使然。他说,自己比较相信非受控制的人生和社会,这样反而能活得更

好、更自然。当然,人生的某些必然也给了陈志武太多惊喜。“女儿一定是我这辈子最幸运、最好的礼物。”每次和旁人谈起两个女儿,骄傲和幸福总是洋溢在他的脸上。两个女儿由于没有在中国出生长大,对许多中国文化、历史难以理解,常常质疑陈志武回国调研、考察的动机和行为。而陈志武却不会以传统中国式的教育方式,强迫女儿们去认同甚至改变。

“或许和我自己对于私人空间、个人自由的推崇有关系,我尊重女儿们,尊重其他学者,甚至包括我的对手,因为我也希望他们给予我同样的尊重和自由。”陈志武坦言自己仍有一些传统的中国思想,但是在教育理念、治学理念上都更认同西方的观点。

老友李利明总是劝说陈志武,尽量减少一点工作时间,给女儿更多的管教和关爱。陈志武的确这么做了,但是不同于一般的中国家长的“家长式”约束。陈志武总是觉得,既然很幸运地拥有了两个女儿,就一定要给予她们最好的关爱、最完整的父母。”从道德和伦理上来说,母亲可以选择要不要孩子,但是子女却不能选择自己的父母。”他说,西方社会和东方社会最大的差别在于,中国人强调子女对于父母的责任和赡养义务,而西方社会则更多地强调父母对子女的责任和义务。

多年前陈志武曾给两个女儿写过一封信,在信中他提到,“你们一生幸福是我们最大的愿望和指望,长大以后你们做任何事情都应以是否让自己幸福为标准。”

“我很幸运,自己和太太可以有足够高的收入、有较好的金融投资品选择,未来对于女儿们可以没有任何经济上的要求。”陈志武说,自己和太太已经做了非常充足的准备。等自己真正老去,要么雇人照顾,要么去养老院。总之,作为父母的他们,一定会在经济上做好各种安排,不会成为女儿们的负担。

陈志武说,自己如此安排,并不是担心女儿们不孝顺,而是太爱自己女儿们,太珍惜这份“幸运的礼物”。同时,也希望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告诉女儿们,等到她们长大成家后,也教育自己的子女这样做,要一代代实现自己在经济上的独立、自立,维护自己的尊严。“说白了,我不想看到孩子们把生子养女看成是一种利益需要、把子女当成养老避险的工具,在自己选择怀孕、生孩子之前,你必须问自己:是不是因为热爱小孩、热爱生命才怀孕育女?”

这几年,每年暑假,陈志武和太太都会带着两个女儿在中国内地待上一两个月,在做学术研究的同时带着全家人四处旅行、感受中国文化。“按照美国法律,等到明年,我的小儿儿就可以自己单独过暑假了,或许她就不会再和我回国休假。当然,这是她的选择,我尊重她。”虽然陈志武也偶尔会向朋友们抱怨青春期的女儿儿让自己颇感头痛,但是他仍旧是以一个慈父、一个朋友的心态去关心女儿的成长。

在陈志武看来,教育子女也好,学术研究也罢,给对方更多的空间去学习去思考,或许对方才能真正了解自己,强迫对方接受自己的想法和观点着实不可取。

从赴美留学算起,陈志武已经远离中国大陆近三十年。而三十年的时间,陈志武经历了求学就业、功成名就等在自己看来是“随机事件”的人生轨迹。或许很多人甚至自己的女儿很难体会陈志武走到今日的艰辛和付出,但,陈志武仍旧对今天自己拥有的一切心存感激。

谈及自己未来是否会完全回到中国大陆,继续自己的工作和研究,陈志武坦言,“离开时间太久了,对于国内很多人际关系、学术环境等都不是那么熟悉了。”即便仍旧会关注中国金融、经济领域,即使仍旧会执着于中国历史、文化、宗教和金融学的跨领域研究,自己应该也不会彻底在国内某个学术机构或高校“扎根”任职。

或许,这就是所谓的“近乡情怯”吧!